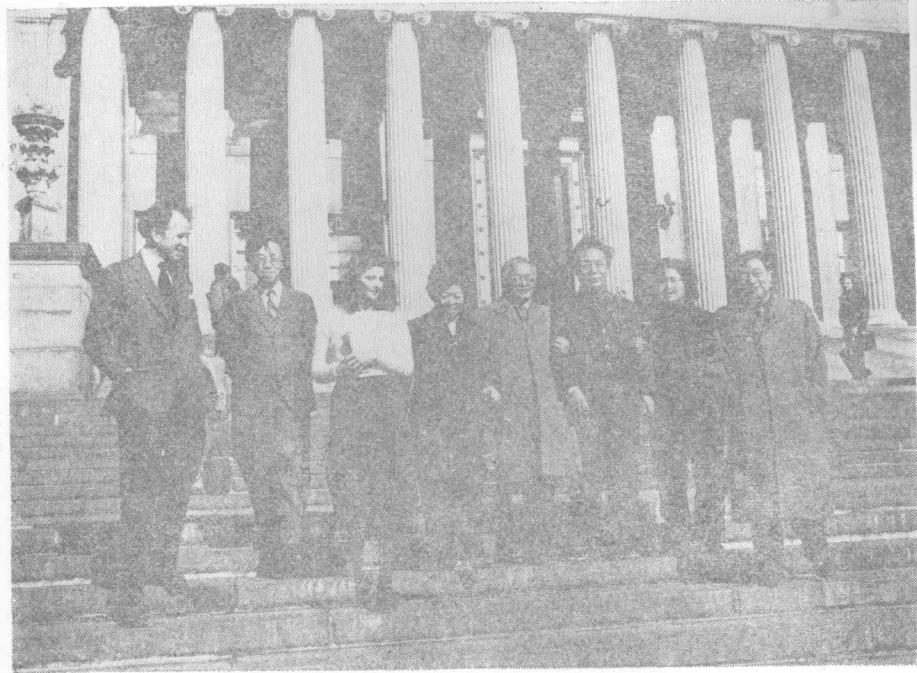


诗探索

3 1981



艾青（右三）卞之琳（右四）王蒙（左二）
冯亦代（右一）等在哥伦比亚大学

诗 探 索

季 刊

祝愿企 吴 (4)

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

优秀新诗获奖作品篇目 (6)

今日新诗面临艺术问题 卡之琳 (8)

· 新探索 ·

第五十七个黎明 赵 恺创作 熊光炯评点 (17)

春潮在望 白 桦创作 刘再复评点 (23)

圆圈和三角的进行曲 邓海南创作 樊发稼评点 (28)

· 新诗发展问题探讨 ·

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

——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李元洛 (32)

沿着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道路前进

——为孙绍振一辩兼与程代熙商榷 江 枫 (40)

目前新诗的美学突破 鹿国治 (47)

莫将腐朽当神奇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傅子玖 黄后楼 (57)

“崛起”的艺术规律问题浅议

——《诗刊》“问题讨论”读后漫记……舒 平 (63)

请允许我们说话……纪 川 许 洁 (69)

歌唱在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杨匡汉 (73)

思索·尝试·前进

——诗林漫步……吴 嘉 (83)

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

——《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导论……孙玉石 (91)

叶圣陶在“五四”时期的新诗……陈 辽 (108)

•诗人研究•

公刘诗作新探……叶 槿 (111)

蔡其矫诗歌的语言特色……周佩红 (122)

仓央嘉措情歌艺术谈……杨恩洪 (127)

炼虹和他的《红色绿色的歌》……骆寒超 (133)

三分与七分……方 晴 (137)

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说起……其 心 (139)

读诗手札……吕 进 (145)

一个在极度表现中的生命……遥 攀 (149)

•诗窗•

天才·诗人·诗……(俄)别林斯基著 理 然译 (153)

英美诗创作中的物我关系……郑 敏 (160)

• 新诗品 •

是良心，就让它颤抖吧

——读《心石》 李 拔 (172)

叙事长诗的新收获 汪之夫 (176)

• 名诗欣赏 •

波澜不惊撼人心

——读希克梅特的长诗《卓娅》 陈志铭 (179)

• 诗通讯 •

诗美书怀

——致友人书 杨 牧 (184)

新诗出版发行令人忧虑 刘湛秋 (187)

各地诗刊巡礼 翟 飞等 (190)

• 补白 •

笨嘴说诗 孟 河 (192)

灵感 郭 龙 (178)

歌德谈诗 (175)

• 美术摄影 •

友谊 (封二)

在密密的森林里 (速写两幅) 允 贤 (封三)

封面设计 孔 都

祝愿

企 吴

新诗有史以来评过奖吗？没有，这是第一次。

建国三十二年来的诗歌获过奖吗？没有，这也是第一次。

仅仅这一点，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的评奖与获奖，是值得我们热烈庆贺的喜事。这是我国新诗史上的一个创举，是新时期诗歌的一次检阅，是广大诗人多年来辛勤劳动的一个收获。

这是两个毋庸否认的事实：

其一，时间是七九至八〇年。也就是说，获奖作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成果。正是由于三中全会路线在斗争中的贯彻，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不仅复苏，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不可忽视的发展与开拓，时代感加强了，主题与题材更多样了，表现手法的革新也突出了。这是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是诗歌界思想解放与艺术创新的胜利。

其二，三十五名获奖作者中，多半是青年诗人，而且约三分之一是近一二年出现的新秀。青年诗人的敢于思考，才华迸发，是我国诗坛的希望所在。完全可以断言，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两代诗人的“接力赛”中，我国革命诗歌的生命，将在新的，战斗的，可信赖的一代活跃的血液里得以延续。“危机”论应

当休矣。

自然，这次评奖，由于经验不足和某些客观原因，有的入选的并非是思想与艺术化合的上乘之作，在风格和流派方面也注意不周。但总起来说，这两年诗歌可观的实绩足以证明，缪斯在中国大地上永远微笑。

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与胜利。我们还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永不休止地歌唱。

人民需要我们更加新鲜有力的声音。让我们坚持诗歌通向人民，使时代的步伐、人民的心声和现实的矛盾，在众多的篇章中得到更强烈、更深刻的反映。

诗人们，第一排的座席是永远虚位以待的。让我们排除掉一切妨碍诗人大胆创造、妨碍诗艺展翅高飞的东西，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攀登更高的艺术峰巅。

出人意料的后起之秀能与他们在诗坛上的前驱匹比，是值得高兴，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让我们老中青诗人团结起来，互相挑战，互相竞赛，追求艺术个性，发展风格流派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工程中并驾齐驱。

群星灿烂的日子就在前面。让我们举起双臂迎接它！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北京

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

诗人优秀新诗获奖作品篇目

(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八万里风云录

张万舒 《安徽文艺》1979·1

呼声

李发模 《诗刊》1979·2

沉思

公 刘 《诗刊》1979·2

春潮在望

白 桦 《人民日报》1979·3·17

春风燕语

刘 征 《诗刊》1979·5

不满

骆耕野 《诗刊》1979·5

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张学梦 《诗刊》1979·5

辣椒歌

陈显荣 《诗刊》1979·6

关于入党动机

曲有源 《诗刊》1979·7

探求

王辽生 《雨花》1979·7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 婷 《诗刊》1979·7

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 《诗刊》1979·8

湘江夜

梁如云 《诗刊》1979·8

战火中纪事

纪 鹏 《解放军文艺》1979·8

重量

韩 瀚 《清明》1979·2 (10

月出版)

- 对一座大山的询问 边国政 《诗刊》1979·12
- 给他 林子 《诗刊》1980·1
- 司马祠漫想 毛绮 《韩城文艺》1980·2
- 祖国啊，我要燃烧·夙愿 叶文福 《文汇增刊》1980·3
- 北山恋 刘章 《诗刊》1980·4
- 答—— 高伐林 《诗刊》1980·4
- 播种者 徐刚 《人民文学》1980·5
- 汗水 傅天琳 《星星》1980·5
- 夜莺与鹦鹉 伊敏·吐尔逊 《新疆文艺》
1980·6
- 无名河 林希 《诗刊》1980·6
- 寻觅 朱红 《诗刊》1980·8
- 回乡纪事 肖振荣 《诗刊》1980·8
- 故园六咏 流沙河 《诗刊》1980·9
- 假如我重活一次 未央 《诗刊》1980·9
- 我是青年 杨牧 《新疆文学》1980·10
- 干妈 叶延滨 《诗刊》1980·10
- 雪白的墙 梁小斌 《诗刊》1980·10
- 我爱 赵恺 《诗刊》1980·11
- 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 刘祖慈 《诗刊》1980·11
- 在工业区拾到的抒情诗 雁翼 《诗刊》1980·12

卞之琳

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

〔按〕本文原是作者1980年秋冬间访美的英文讲稿之一。同年十二月四日，作者大致据此用中文在香港大学讲过一次。作者原想用中文改写发表，目前无暇及此，幸承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张曼仪女士为当地出版的《抖擞》双月刊1981年5月号译成中文。译文曾经作者核订，与原文略有出入，现再经作者稍加更动，并注出了两处有关的资料。

新诗到今天还可以说是“新”。所谓“新”，有两个意义：第一，作为文学的一个类型，新诗自“五四”发轫以来，仍富有朝气，生命力仍然旺盛，极有发展前途；第二，新诗虽然诞生了六十年，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占统治地位也有半世纪之久，可是不少人仍然目之为谬种，不承认它为正宗。关于第一点，事实摆得明白，因此下面只讨论第二点。

今天直接否定新诗的论调已不再出现了。虽然如此，从国内报刊上近来有关新诗的讨论可以见出评论界正从三个角度，从内

外，对之加以贬抑。这一来，“新诗”这个概念以及新诗的创作道路重形混乱了。尽管这些论见之所以乖谬，是由于误解所致，可以一笑置之，但由此可以看出诗也确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质疑一：新诗是散文化吗？

对于目前创作和发表的大部分新诗而言，上面的指责似乎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这种攻击有时出于了解片面。典型的例子是《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上题为《汉语诗歌形式民族化问题探索》的一篇论文。文章的写作日期虽然近至1979年至1980年之间，作者却好像还在重提1919年前的陈旧主张。他的出发点据说是反对“西化”。所谓“民族化”的主张就是恢复中国诗歌吟咏的传统和采取古典诗词的平仄律。实际上他的论据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把“白话”和“散文”，“新诗”和“自由诗”等同起来。因此便认为用现代口语写成的诗，原本是为了朗诵的，也就不可能是诗的，必然流为“散文化”；而在写自由诗的同时，利用说话的自然节奏为基础来尝试产生新格律又不免“欧化”，理应被摒斥。

姑毋论这篇文章语不中的，结论也大可商榷，却也多少表达了读众对新诗现状的不满。今日新诗的主要体裁是自由体和一种所谓“半格律体”（每节四行或两行，各行长短大致相似，押韵随便，大多隔行押韵，而且一韵到底）。这样子写成的诗，撇开无法“吟咏”（严格说是“哼”，还不是“唱”）这一点不谈，即使用朗诵的标准来衡量，在声音效果上当然远逊于古典诗词和民歌。上述的不满就是因此产生。

这种不满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对中国古典诗歌稍有认识的人总以为诗的语言必须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意象丰满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淡入微，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凡此种种正是传统诗的一种特色，也形成了传统诗艺一种必

备的要素。今日的新诗却普遍地缺乏这些特质。反之，白话诗大都枝蔓、懒散，纵然不是满纸标语和滥调，也充斥着钝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

上述两个缺点正是问题症结所在，新诗不能回避。而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棘手。过去六十年在理论和实践、在创作自由体和新格律体的经验，不容漠视。我们假如不那么抱有成见，偏要无视这方面已取得的成就，不愿意了解从而受益，那么问题就不难达致初步解决。墨守古典诗格律的成规，就算兼采真正民歌的自发性音韵考虑，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肯定会走进死胡同。

质疑二：创新就一定难懂吗？

新诗经过多年的停滞以至退化，近两年（严格说是从1978下半年或1979年初算起）也涌现了一些并非“穿了制服”的新诗，争取到刊物上一角的位置。于是不少有地位的诗人和批评家马上齐声非议。反对的唯一理由是“难懂”。长久以来，在国内，“难懂”二字，对于一位诗人压力很大，所以不要因为易用而随便滥用。

举个例子。《诗刊》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正可以说明上述的论点。这位批评家不满意近日报刊上出现的所谓“朦胧”诗。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同年一月《诗刊》上发表的短诗《秋》，《秋》的作者在四十年代成名，解放后难得发表诗。这位批评家跟一位写诗的朋友经过一个来小时的共同研究，才“猜”到“作者的用意是把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比作‘阵雨喧闹的夏季’，而现在，一切都象秋天一样的明净爽朗了。”他认为这句简单的说明就够得上是首好诗了，“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又何必写得这样深奥难懂呢？”接着他便从个别字句的运用上挑毛病：“‘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开头一句就叫人捉摸不透。初打鸣的小公鸡可能发出不成熟的音调，大公鸡的声调就成熟了。可鸽哨是一种发声的器具，它的音调很难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至于最

后一行“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又引起他的疑问：“信息不是一种物质实体，它能被扫描出来呀？”如果这个论据足以成立，那么毛主席的名句“她在丛中笑”就荒谬绝伦；连这位批评家认为“并无‘朦胧’之处”的李商隐《无题》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也当然是不通的了。如此说长道短未免轻率。

平心而论，这位批评家虽然不中要害，却也不是无的放矢。新诗的创作确实存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过去三十年来大量产生了千篇一律的新诗，读来枯燥乏味；始于对这个倾向的反动，颇有些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开始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他们的作品有时颇具个性和独创性，这个事实应该获得大家的尊重。可是一种不良的倾向也露了端倪，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例如，有些人毫无必要而废除了标点，把诗行任意排列——这一套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久已实行的办法，着实毫无道理，至少我可看不出来，结果不外增添了作品的奥秘色彩。作品要真是新颖的，就无需在外表上翻视觉花样，否则纵使捏弄成奇形怪状，也于事无补。说到这里，我禁不住要谈谈我对台湾新诗的一些看法，虽然我实在没有资格谈，因为我知道的仍然很少。根据我对那边新诗的有限知识，我彷彿捉摸到它的主要倾向。要是我说：台湾新诗主要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这话说得对，让我大胆下个结论：今日台湾的新诗，除了与大陆共同承受我国古典诗的影响有迹可寻之外，刚好代表了大陆新诗多少年来主要倾向的另一个极端。上述那位讲民族化的批评家尽管枉费心机，要反对的正是这种所谓“西化”的倾向，尤其是采用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虽然他自己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叫“现代主义”。在对待这第二个问题上，我照例采取中庸之道。有关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提出以下的建议：除了更多掌握我国古典诗和民歌的要素以及外国传统诗和西方现代主义诗的新感性、新表现手法之外，最重要的是认识“五四”以来新诗的传统，包括诗艺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

质疑三：新诗不适于用格律吗？

近两年来随着新诗创作的日趋蓬勃，新诗界又显示了种种征兆，要求恢复格律体和对格律作多方面的探索，虽则能见诸报刊的机会很少。像过去一样，那些侥倖能在刊物上披露的，马上便招致了器量不大的诗人和批评家的侧目，只因他们习惯了创作和欣赏自由诗。事实上，没有人否认今日的新诗是自由体占主导地位的，那些提倡和试验新格律体的人只是恰如其份地要求与自由体共存罢了。但自由体的推崇者却不耐烦听听人家在说什么话，不尝试理解人家在做什么事。

从理论上说，以“戴着脚镣跳舞”为格律体辩护，只能是自我嘲弄。闻一多在二十年代开始探讨新诗格律而不幸向西方借过来的这句胡涂话不知害苦了多少同道上的探索者。实际上，所有尝试为格律体在新诗领域里赢得一席位置的人，包括闻一多本人在内，早已扬弃了这条论据。迟至六十年代何其芳再度倡议新格律，还把这个论点修正过，提出跳舞的人必须懂得步法。这个说法是令人信服的，不但我国认为诗所以有别于散文的传统概念完全契合，而且与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把诗比喻作跳舞，把散文比喻作走路的看法相符。要为格律体辩护，也可以引证艾略特（T. S. Eliot）一句话：就广义说，没有诗是真正自由的。我们还进一步可以引经据典，诉诸恩格斯，他充分赏识黑格尔这句话：“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

在实践方面，大部分所谓白话格律诗，尤其是四行一节的“格律体”，产生于二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以及偶尔散见于今日，确是值得嘲讽为“豆腐乾诗”或“方块诗”的。这方面格律试验的失败，主要还不在于机械模仿西洋诗（大致除了法国诗）格律而在于勉强用字数为量度诗行的单位。这些格律体的试验者和反对者都没有意识到现代口语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而是自然分成几个字（最常见是两个或三个字）一组说出来。倒

是艾青在1953年由作家协会召开的“诗的形式问题”讨论会上说得对：“格律诗要求每一句有一定的音节”（这里指“音组”或“顿”，有点相当于英诗的“音步”）。用现代口语写成的一个诗节或一篇诗，尽管每行字数相同，眼看是均齐的，念起来可能音节整齐，也可能不整齐。所以，音组或顿的适当运用，而不是押韵，在建立新格律体上占关键性的位置，因为，有如韵式一样，音组也可以容许各式各样的组合和变化。所以，新格律的基本要求可以极其简单，但同时可以让诗人有自由发挥才华的余地。不承认真正的格律体新诗的存在和初步成就，势必贻人所谓“全是散文化”的口实，导致对新诗的全盘否定，这恐非这些论者始料所及。

总起来说，上文概括谈及中国新诗艺术及其前途的几个问题，形成一个互相牵连的三角关系；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必得牵涉到其余的两个。问题的提法，我以为，也就包括了问题的解决道路。

虽然如此，从上述就个别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可以得出两个总的教训：这两点显而易见触及这些纷争与混乱的根源。

第一，要真正理解本国的或传统的事物，必须对外国事物有起码的知识，反之亦然。可悲的是，这正是那些高呼“民族化”以反对“西化”的人所往往缺少的。这里涉及的是诗的问题。对于一般为人接受的一种写诗理论，我一向有所保留。在文艺的范畴内提倡“民族形式”，无疑是有道理的。我只是提出这个疑问：为什么不强调一下“民族精神”呢？（“民族风格”，如果理解为包括内在精神，那倒是差不多。）外在的形式，如同风俗习惯，是易于改变的，也不难适应比较合理的用法，只要看看汉字从传统的直写改变到西方的横写，马上得到普遍的接受，可见一斑。这个事例显示了科学或常识的胜利，绝对不是由于盲目的崇拜。另一方面，土生土长的事物不巧跟外国事物相似又往往被误认为舶来品，因而加以歧视，甚至斥逐。以诗歌的押韵为例，今天写诗的人几乎一律通篇采取一韵到底，忘记了按照我国古典诗格律以至民歌（除了大鼓等）创作的习例，换韵是正当的办法。

被评为“难懂”的短诗《秋》恰巧是有规律换韵^[1]。交叉韵或称“抱韵”在《诗经》和《花间集》里都常用，阴韵在《诗经》里也并不少见。这些韵式虽则在过去因时代变化而废弃不用了，今天在又变化了的时代，在借鉴我国古典诗律以及西洋诗律的基础上，再拿来试用到新诗上，难道就算违反我国传统吗？再者，上述那位以新诗为散文化、提倡恢复平仄律以取代西洋格律的批评家在文中引了三首活的民歌，恰好反证了他的理论，说明阴韵以至交叉韵式在今日真正的民歌里还没有灭绝。^[2]“知己知彼”这句话在目前讨论新诗问题上还是用得着。

第二，“五四”以来的新诗也多少形成了一个传统。它有一段悠久的经验，产生过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是“新”的诗篇，既有独创的又有传统的风格，大胆进入了无韵自由体的“异域”，同时也认真开始探索过我国古典诗律和外国诗律所能提供的参考。它积累了丰富的前例：成功固然可以启发后来，失败也足以为鉴戒。无视这个传统或者拒绝加以公允的研究，对新诗的发展只能是有害而无益。所以，就中国新诗艺术而论，我们今日决不能从零开始，因为我们的基础不是零。

注：〔1〕为了说明杜运燮《秋》这首诗是每节换韵的，附录全诗如下：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

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

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

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象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

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

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

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

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

吊车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

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这里第一节是“季”“忆”押韵，第二节换成“伤”“向”押韵，第三节换成“远”“泉”押韵，第四节换成“酒”“透”押韵，第五节又换回“气”“息”押韵——第一节的用韵。

注：〔2〕第一首《卖柴歌》，据说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卖柴为生的贫苦农民采用湖北麻城调集体创作”的：

一进瓮门街，〔街，方言读该〕

眼望尽是柴，

今天的柴多不好卖，

卖不出价钱来。

土匪“清乡团”，

做事尽纳蛮，